
平台经济下的劳动控制与抵抗

——以网络文学平台的田野调研为例

范玉仙,王 晨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 710049)

摘要: 平台经济使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更隐蔽、更精密。资本对平台的逻辑宰制体现在使劳动力转化为劳动的劳动过程控制中,具体以控制机制与同意机制为手段:一方面,它通过数据垄断和算法应用及计件薪资机制、竞争激励机制、评价反馈机制构建起隐蔽的强技术控制机制与精密的软组织控制机制;另一方面,平台经济时代资本的手段也更加高明和巧妙,它通过制造梦想、公平感知和劳动游戏化,从而“获取”劳动者的自发同意,导致劳动者抵抗意愿不断下降。平台的劳动控制机制,揭示了平台劳动者面临的技术囚徒、虚假自由和主体性消解等劳动困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超越资本逻辑,确立平台经济新型劳资关系,强化平台责任,放大平台经济积极作用。

关键词: 劳动控制; 平台经济; 网文平台; 劳动过程理论

中图分类号: F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 2674(2023)06 - 026 - 10

一、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机制

劳动控制起源于马克思。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过程的特殊性时指出,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后为了使劳动正常进行和生产资料正常使用对工人进行监视。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进一步指出,劳动控制实际上是资本家的职责。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的不确定性、获取更多剩余价值,一般通过加强对劳动过程的技术控制与组织控制来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潜力。平台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变革了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以及企业生产组织形式,技术与组织控制手段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平台构建起一套隐蔽的强技术控制机制与精密的软组织控制机制,“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1]454,455}

1. 技术控制: 隐蔽的强控制

机器大工业时期,资本家把机器当作控制劳动过程与剥削劳动力的重要手段。机器首先扩大了资本控制的范围,妇女和儿童被抛到劳动力市场上受到资本的直接统治,这“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惯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1]454}并且,机器为资本创造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条件与吮吸每一滴劳动的动机,最终“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

收稿日期:2023 - 02 - 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BJL108)

作者简介: 范玉仙,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值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1]469}当正常工作日确立后,资本家把主意打到了劳动时间的内涵量上,机器成为吮吸劳动的加速器,其每一次改进都迫使工人“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工人被压榨到精疲力竭。^{[1]472}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机器的发展使“管理部门有机会完全用机械手段来做过去打算用组织手段和纪律手段去做的事”。^{[2]173}以控制机床为例,数字控制系统将劳动过程分解、细化,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有效地解决了工人磨洋工的问题,但“科学越是被纳入到劳动过程之中,工人就越不了解这种过程,作为智力产物的机器越是复杂,工人就越不能理解和控制这种机器”,^{[2]380}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丧失对机器的控制力。

迈入平台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变革了劳动过程的各个方面,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资料都呈现出数字化趋势。技术工作者和数字劳动者成为特殊劳动力,数据成为平台经济劳动过程的重要原料,数字技术成为构建平台、生产数字商品与服务的劳动资料。^[3]如果说工厂时代机器是资本家控制劳动过程和剥削劳动力的重要手段,那么在平台经济时代,平台资本借助算法技术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升级。算法是一种以大数据为基础、以互联网为载体、以机器学习为路径的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平台企业并推动了平台运营的嬗变,进而催生出技术控制的新形态——算法控制。^[4]算法作为劳动资料对劳动过程每一个环节实施精准的控制,包括:分配与匹配算法控制劳动者的劳动需求;数据追踪与机器学习算法监督与管理劳动者;数据交易与动态定价算法对劳动者进行绩效考核。^[5]从本质上讲,算法控制以算法技术为基础,以任务分配、监督管理、绩效考核三种控制机制为具体实践内容,将劳动力转化为劳动,从而谋求更多剩余价值(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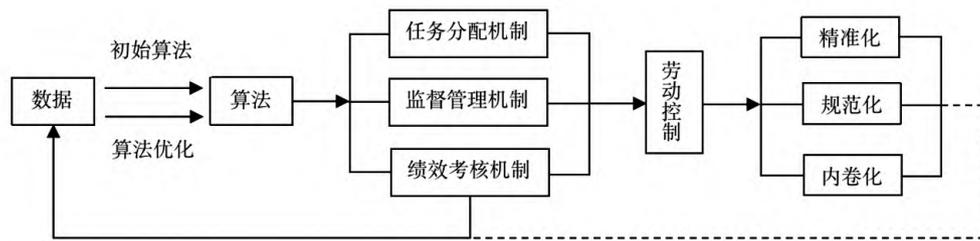


图1 劳动过程视角下平台技术控制机制

(1) 平台技术通过任务分配机制实现劳动控制精准化

任务分配机制从本质上来讲是算法支配劳动者。平台依靠算法技术“牢牢控制了劳动者与市场的接口,劳动者无法通过平台之外的渠道高效率出售自己的劳动能力”,^[6]换言之,算法技术使劳动权利掌握在平台手里,劳动者只有依附平台才能获得劳动机会,这加剧了劳资双方权力失衡的问题。进一步地,平台利用算法分配劳动机会、精准匹配最合适的劳动者,一方面根据消费者的偏好需求推送相关内容以诱导消费者消费,另一方面将任务分配给综合评价分数高的劳动者进而实现任务分配的最优决策,这使劳动者和消费者完全处于算法控制之下。不仅如此,算法与市场的合谋使平台实现了对劳动者的最大利用化,数据成为一种客观标准,劳动者在数据的支配下不得不学习各种技能提升自己,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对自身的培训。

(2) 平台技术通过重构监管过程促进劳动过程规范化

算法重构了平台监视劳动过程的方式。平台系统对劳动状态、劳动进度等以数据的形式进行实时记录,并加工处理运用到对劳动过程的监督与管理中,“超级全景监狱”成为现实,平台由此实现了对劳动者全方位无死角的监视。“全景监狱”来自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全景敞视主义思想,后被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发展,波斯特立足信息时代提出了“超级全景监狱”的概念,认为电子网实现了对人全面的、随时随地的、更加隐蔽的监视,是“一套没有围墙、窗子、塔楼和狱卒的监督系统”。^{[7]127}同时,劳动

过程的透明化为劳动过程的标准化提供了可能,劳动者必须严格按照平台规定进行,否则会被强制出局。另外,平台将控制职能“转移到由管理部门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尽可能地加以控制的一种装置上去”,^{[2]190}把自身与劳动者之间的冲突转嫁到算法系统与劳动者身上,并在表面上扮演了缓和双方矛盾的角色。

(3) 以算法驱动的绩效考核机制导致劳动力内卷化

绩效考核机制实际上是对劳动力“量”和“质”的控制。算法综合各种数据信息进行复杂计算得出最终的评级来评估劳动者的工作表现,并根据评级结果对劳动者实施进入和退出管理,即如果劳动者的虚拟积分高于平台标准,那么算法系统会给予劳动者一定奖励,反之,算法系统会冻结劳动者账号甚至永久封号。这种数字声誉评级倒逼劳动者对自身的工作方式、工作态度、工作时长进行自我纠偏,加剧了劳动者之间的内卷化。不仅如此,算法将劳动者绩效提升情况转化为更为严苛的考核标准,不断试探劳动者的生理极限与心理极限,以此最大限度吮吸每一滴劳动,算法优化升级的结果必然是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更加变本加厉。劳动者在这种算法主导的绩效考核机制下身心俱疲,投身平台劳动不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8]159}

总之,平台经济下的劳动控制与剥削并没有因为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物质资料的不断丰富而削弱。虽然平台经济时代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相比机器大工业时代得到了十分明显的改善,但从工人被机器压榨到精疲力竭与劳动者被算法技术折磨到身心俱疲的结果来看,劳动者仍然受到资本严格的控制与残酷的剥削。由此可见,技术革命非但没有解放劳动力,反而成为一种隐形的手铐和脚链,强化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

2. 组织控制:精密的软控制

劳动资料的变革推动了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家通过协作“提高劳动过程的生产力来更有力地剥削劳动过程”,^{[1]389}工人成为从事一种局部职能的器官。机器大工业时代,“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1]443}换言之,机器和发达的机器体系消灭了以手工业和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技术为劳动过程的分割奠定了物质条件,泰罗制被普遍地运用到工厂中,概念与执行的分离使工人执行工作不再由自己的概念指导而是由经理部门的概念指导,资本家由此牢牢掌控了劳动过程的每一个步骤与执行方式。

迈入平台经济时代,依托算法技术的各种弹性灵活的用工方式逐步兴起并呈现扩张趋势。平台资本给予了劳动者自主决定劳动时空甚至是劳动量的权力。难道说资本放松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不再想方设法延长劳动过程的长度或者提高劳动过程的强度?那劳动力的“量”和“质”是如何保证的?把握平台经济时代组织控制手段的“变”与“不变”,有助于揭开劳动自主性的面纱,具体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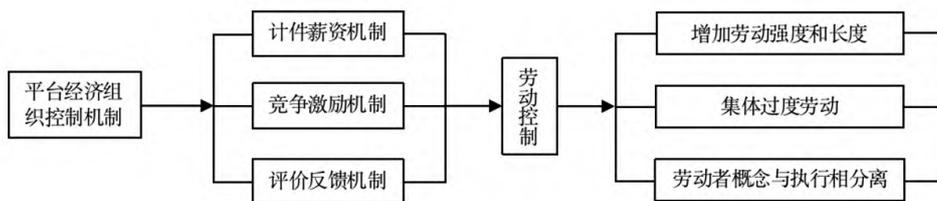


图 2 劳动过程视角下平台组织控制机制

(1) 计件薪资机制增加劳动强度与长度

计件薪资机制“提供了一个十分确定的计算劳动强度的尺度”,使资本家“对劳动的监督大部分就成为多余的了”,^{[1]636}劳动者在多劳多得理念的驱使下不断自我加压。一般而言,工作量直接决定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就是说,劳动者只有提供一定的劳动量才能获得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收入,而平台的

垄断性决定了劳动者没有议价权,因此劳动者的唯一选择是提高工作量:一种途径是增加劳动强度,劳动者通过掌握一定技能提高效率,尽可能地缩短单位产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使每分每秒充满更多剩余劳动;另一种途径是延长劳动时间,劳动者通过超时工作获得高薪,劳动力几乎达到了最大量的消耗,例如全职劳动者为了获取维持生存的基本资料几乎全天候工作,工作与生活失去平衡,兼职劳动者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牺牲休闲娱乐的时间进行工作,劳逸界限越来越模糊。平台劳动者在这种多劳多得的计件薪资机制下,尽可能地消耗自己的劳动力,不知不觉就增加了劳动强度和长度。

(2) 竞争激励机制造成集体过度劳动

平台推出一系列排行榜单使劳动者参与到你追我赶的比拼中,劳动者在遭受生理和心理双重压力的同时,深陷于集体的过度劳动之中,这种过度劳动不仅“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且“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1]733}劳动者为了获取更多劳动机会和劳动权利不得不拼命工作换取高积分,上榜后,劳动者为了保持竞争优势一般会提高工作量来确保自己的成绩保持在中上游,如此一来,劳动者内部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而平台借助排行规则淘汰掉了尾部劳动者,“将工人建构为身处诸多相互竞争与冲突的他者中的一员”。^{[9]89}平台劳动者在这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激励机制下过度支出体力与脑力劳动,不仅不利于身心健康,而且导致平均工资水平不断降低。

(3) 评价反馈机制导致劳动者概念与执行相分离

评价反馈机制给予了消费者监督劳动过程的权力,平台实现了对劳动力“质”的控制。具体来看,消费者以一种围观的形式监督与管理劳动者的劳动过程:第一,对劳动时间的监督与管理。消费者可以通过平台系统掌握劳动者的行动轨迹,这意味着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不再受自己控制。第二,对劳动内容的监督与管理。评价反馈机制建立起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强互动关系,在这种强互动关系下,劳动者会根据消费者的反馈调整工作方式,其劳动内容不再完全由自己的“概念”指导,而是由自己的“概念”与消费者的“概念”双重指导。第三,对劳动质量的监督与管理。平台根据消费者的评分对劳动者进行奖惩,进一步说,消费者的评分直接影响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这一规则经常引发双方之间的冲突。第四,对劳动态度的监督与管理。劳动者为了获得好评打造出一个可供展示的外在形象,造成自身实际情感与情感劳动的分离,最终劳动者在这种消费者介入的评价反馈机制下“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7]158}

总之,平台资本巧妙地将自身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欲望转化为劳动者提高个人收入水平的愿望。从表面上看,平台劳动者可以自主选择劳动时间,与机器大工业时代工厂主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截然不同,前者是自由的劳动时间,后者是强制的劳动时间,但从上述组织控制机制与其结果来看,两者在本质上都是资本为谋求更多剩余价值而采取的手段,平台在给予劳动者相当程度自主性的同时,寄希望于最大限度地侵占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签订的不是劳动合同而是一种临时用工协议,平台通过“去劳动关系化”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用工成本,并逃避了相关的法律责任与义务。可见,资本不仅没有放松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还借助组织控制机制与“去劳动关系化”达到了对劳动者控制最大化:第一,控制主体由单一雇主增加到多个雇主。平台借助评价反馈机制将劳动者的收益与消费者的评分紧密绑定在一起,进而将市场风险转嫁给劳动者。平台劳动者为了获得好评,不仅要付出体力与脑力劳动,还要投入大量的情感劳动。与此同时,平台从“台前”走向“幕后”,将自身与劳动者之间的冲突转嫁到消费者与劳动者身上。第二,控制形式由明显的强控制转变为难以察觉的软控制。平台抓住年轻人渴望自主安排工作与生活的心理,采用“人性化”的组织控制手段实现了对劳动者的隐形化管理,使劳动者将自身增加劳动强度与长度的行为归因为自愿选择,但真相是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和控制程度进一步加深了,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10]199}

二、平台劳动者的同意逻辑与抵抗策略

强制和同意是理解与考察劳动过程的两个重要维度,马克思与布雷弗曼皆从强制的视角揭示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却从工人主体性出发指出劳动者的同意同样重要。平台经济时代资本制造同意的手段相较布若威在联合公司观察到的手段更为高明和巧妙,平台提供了一种兴趣与工作紧密结合的可能,劳动者抵抗意愿不断下降,他们即便不满也不会反抗资本而是指向再生产。^{[9]100}

1. 资方的制造同意机制高明而巧妙

布若威通过对比封建主义劳动过程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得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是“同时掩饰和赢得剩余价值”,并指出超额游戏、内部劳动力市场与内部国家是资本家掩饰和赢得剩余价值的主要方式。具体来看,资本家将劳动过程构建为一个游戏,劳动者对游戏的参与意味着对界定游戏规则的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的同意;^{[9]90}通过培育竞争性,个体主义使工人之间的横向冲突增加、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纵向冲突减少;通过建立申诉机制和谈判机制,工人与企业的利益得到调整;将“工人当作个体……而不是阶级的一员”,增强了劳动者对企业的认同感。

迈入平台经济时代,制造同意机制不仅完全剥离掉强制劳动的外衣,而且打破了劳动与兴趣的界限,“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理想图景在依托强大数字技术支撑的平台经济中初见端倪。^{[11]435}平台通过制造梦想、公平感知和劳动游戏化,使劳动者主动将个人梦想与平台利益联系起来,积极参与到平台的生产过程中,增强了自身对平台的认同感,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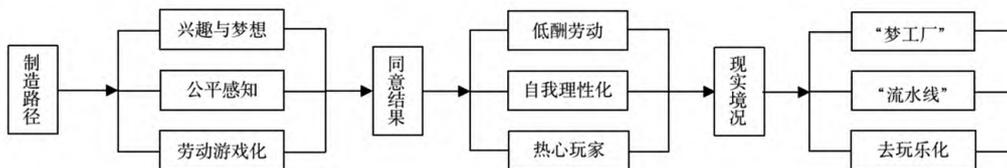


图3 劳动过程视角下平台制造同意机制

(1) 兴趣与梦想支持劳动者低酬劳动

兴趣与梦想使平台劳动不再是谋生的需要而是“人的生命自由、生活乐趣与创作才能”的展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兴趣与工作合二为一体现着“自由劳动”的意蕴:^[12]一方面,它依托数字技术的平台为劳动者提供了施展兴趣与追求梦想的机会和舞台,同时,工作地点灵活化、工作时间弹性化与工作内容非标准化,为平台劳动“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创造了客观条件;^{[10]17}另一方面,劳动者在兴趣与梦想劳动价值理念的支持下愿意进行低酬甚至无酬劳动,并“把克服困难和障碍的过程本身当作人的一种追求,一种实现自我意图的努力,从而在根本上实现人的自由”。^[13]劳动者在这种兴趣与工作相结合的方式下积极发挥自身智慧与灵感,进而展现自我个性与实现自我价值。

(2) 公平感知促使劳动者自我理性化

操作流程标准化、工资体系透明化与评价标准明确化提升了劳动者对平台的信任,劳动者为了获得市场认可不断将自己的能力商品化。流程标准化意味着所有劳动者,无论是年收入千万的“大佬”,还是长期处于低酬或无酬劳动的“小透明”,都需要遵循标准流程,平台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很小。工资体系透明化塑造了劳动者“天道酬勤”的主观体验与感受,他们为了实现收益“不断自我提升、自我监督并进行自我控制”达到“自我理性化”。^[2]平台对劳动者的评价标准十分明确——“用数据说话”,不存在学历、年龄、性别等门槛限制,工作绩效主要看努力程度,这导致大部分劳动者在面临收入不理想时首先将失

败原因归结于自己而不是平台。劳动者在这种对平台规则透明性与平台机会公平性的感知之下,增强了对平台的认同感和忠诚度。

(3) 劳动游戏化使劳动者成为热心玩家

劳动过程的游戏化制造了热心玩家,劳动者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产生了对游戏规则的认同和对游戏的渴望。“卷入游戏并为之所诱惑的模式是普遍的”游戏吸引玩家的地方在于结果的不确定性,而平台劳动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基于这一劳动过程构建的游戏自然也具有不确定性,“这种参与到一个结果未知的游戏中的收益”吸引了劳动者的注意力并刺激了他们额外的努力,同时造成他们彼此之间的竞争。^{[8]78}参与游戏不仅带给了劳动者金钱上的回报,还带来心理上的满足。大部分劳动者在分享经验时,往往“是在沟通游戏得分或竞赛结果而不是金钱上的失败”。^{[8]92}游戏得分和竞赛结果通过赋予劳动者一定声望和成就感,使他们加强了对自身职业身份的认同,进而产生自发的“奴役”。劳动者在赢得游戏的刺激下,将增加劳动供给内化为自觉行动,主动参与到对自己的剥削中。

然而,平台同意机制的背后是资本隐蔽的劳动控制与管理,资本不会因为劳动者带有梦想色彩的动因而放松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而是打着为大众提供追逐梦想舞台的幌子尽可能地吸纳劳动力。劳动与兴趣的统一也与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劳动”相去甚远,劳动者的劳动实践不可避免地带有工厂式生产的色彩,而且“去玩乐化”倾向日益明显,他们“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7]159}

2. 劳动者的抵抗策略有限且被动

马克思曾在手稿中指出“工人作为这个过程的牺牲品却从一开始就处于反抗的关系中”,^{[10]469}因此,劳动控制必然对应着劳动抵抗。机器大工业时代,资本家无限度地延长劳动时间,引起了工人的强烈不满,他们通过召开集会进行抗议,阶级对抗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紧张程度。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家实施泰罗制最大限度地榨取血汗,遭到了劳动者的集体反抗,他们采取罢工的方式与资方对抗。但随着资方控制与剥削手段的不断调整与改进,“工人越来越丧失从资本家手中夺取对生产的控制权的意志和抱负,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到劳动在产品中应占的份额的讨价还价上去了”。^{[2]13}

迈入平台经济时代,生产方式的变革使“嵌入于数字化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关系也日益趋向于数字化转型”。资方通过隐蔽的技术控制机制、精密的组织控制机制以及高明的制造同意机制进一步掩盖了其剥削劳动力的内在本质,严重消解了工人的抵抗意愿。^[14]并且,平台的垄断性决定了劳动者在与平台的抵抗中处于劣势地位,劳动者从签订协议的那一刻起就不得不同意平台规定的各项条款,因而劳动者的抵抗策略较为有限且呈现出被动性的特点:第一,对平台技术控制机制的有限抵抗。一种是利用算法技术,劳动者通过“刷数据”“蹭热点”的方式来增加曝光度获得更多金钱收入;另一种是采取“逆算法”策略,劳动者有意在时间、内容上避开算法呈现的结果打造自己的独特风格进而吸引消费者,但算法黑箱使劳动者在数字实践中处于被动局面,劳动者抵抗算法控制的策略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被动的策略。第二,对平台组织控制机制的有限抵抗。劳动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忽略计件薪资机制、竞争激励机制和评价反馈机制,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节奏工作,或联合消费者利用规则漏洞争取劳动过程的自主性。然而,平台不仅可以制定规则还可以随时更改规则,主动权依然掌握在平台手里,劳动者利用规则的抵抗是一种被动的抵抗。第三,对平台制造同意机制的有限抵抗。劳动者采取同伴互助、向平台管理员提建议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但由于双方力量不对等,劳动者始终处于弱势一方。

三、网文平台控制下的劳动者困境

为了更深入考察平台如何通过加强对劳动者的技术控制、组织控制、意识形态控制来减少劳动力使

用的不确定性,本文作者对 A 网络文学平台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研。A 平台拥有在线网络小说 517 万部,已出版小说近万部。截止到 2022 年 8 月,注册用户约 5668 万,注册作者高达 236 万。发展至今,A 平台已经成为国内头部网络文学网站,是网文平台的典型代表。田野调研期间,笔者观察和记录平台采取的控制手段与管理策略,挖掘和了解签约作者对外部环境的认知与反应,以此深入把握平台建立的控制机制与平台劳动者面临的劳动困境。

1. 劳动者成为算法技术的囚徒

平台依托强大的算法技术从人员筛选、任务分配与执行到绩效考核建立起一套标准化流程。在人员筛选阶段,A 平台从创新之处、主角人设等多个方面对作品进行审核,劳动者只有通过审核才能拿到“入场券”。在任务分配与执行阶段,算法与市场的合谋使作者原本自由的创造活动被数据牵引。A 平台有专门的写作助手软件供作者查看相关数据,如文章收藏与订阅收益等,销售数据倒逼劳动者“对自己的作品进行针对性的成果评估、自我纠偏以及进程控制”,^[15]并将其捆绑在数据好、收益高的类型或题材上进行模式化与套路化写作。并且,A 平台监视着签约作者的作品内容及其更新情况,如作品章节标题、提要、“作者有话说”、图片或链接等违反规定,平台系统会自动锁定相关章节,又如 vip 文章连载期间超过三个月没有更新,平台将解除文章 vip 并采取“永黑”的惩罚措施。在绩效考核阶段,平台系统综合所有作品的字数、点击量、收藏数、评论数、读者打分等因素对其排序,加剧了签约作者之间的竞争。总之,算法技术使劳动过程愈来愈透明化与标准化,签约作者不敢有任何松懈,只能在工作时长、工作方式、工作态度等多个方面严格要求自己。

在人员筛选机制下:21 年 6 月开始申签,从信心满满到现在心如死灰,将近二十杀……从一开始什么都不懂,到后来扒文、看干货、做总结……可还是被杀,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签约过敏体质。(田野记录:20220714)

在数据反馈机制下:①我原本以为自己这一本比上一本有所进步,然而数据告诉我不是,我陷入到了严重的自我怀疑。(田野记录:20220920)②被数据绑架后写文热情不断减少,明知道这种情况要自我调整,但很难做到。(田野记录:20221110)

在系统审核机制下:①A 平台审核究竟什么标准?我辛辛苦苦日万了那么久,因为一个审核没有过,勤奋榜被取消了。(田野记录:20221128)②审核真会折磨作者,我熬夜写了九千字提早更新,结果因为一句话被锁了。(田野记录:20221204)

写了这么多年,还是想说,码字真是一个内耗的过程,不仅是身体……痔疮、头发、乳腺增生、视力下降、做噩梦……还有精神和心理上的,说实话,每一天都是赶鸭子上架,就是明知道写了会赚钱会上榜会比现在多赚几万甚至十多万,但就是卷不起来。(田野记录:20221012)

2. 劳动者深陷虚假自由中

劳动者虽然掌握了劳动时空甚至是劳动量的选择权,但无法拥有劳动时空以及劳动量的主导权,平台宣扬的自主性、自由性皆是一种幻象。计件薪资机制下签约作者的脑力创作逐渐沦落为体力码字。网络文学平台普遍采用 vip 付费阅读模式,即读者需要按照千字几分的价格付费阅读 vip 章节,平台再根据协议规定好的分成比例支付稿酬,也就是说,作品的字数直接决定了作者的稿酬。一些作者使用码字软件(如大神码字等)与他人在线拼字来提高码字速度,写作逐渐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心。竞争激励机制下签约作者被迫“多更”“快更”。A 平台有人工榜单和系统榜单两类榜单,相较自动排榜的系统榜单,作者更在意人工榜单。人工榜单排榜有两项指标:作品没有开通 vip 服务前平台依据收藏排榜,作品开通 vip 服务后平台依据收益排榜,也就是说,作品收藏越多、收益越高越有机会赢得好榜,否则很容易“轮空”或上“毒榜”。作者为了上好榜拼命码字,日更新量从三千增加到六千、九千甚至上万,试图以更

新量“换”收藏数与收益额。平台还推出一系列奖励计划诱使劳动者持续工作以确保劳动的稳定性与连续性。A平台规定,签约作者一个月内每天更新(某一作品vip章节)字数达到或超过三千、六千和九千,平台会分别奖励作者该作品这一个月内vip收入的5%、10%和15%,因此码字成为签约作者最主要的劳动形式。评价反馈机制下签约作者为了获得更多金钱收入不再进行自由的、个性化的创作,而是迎合市场需求写作:一方面读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作者创作作品的类型,一些作者为了快速广泛地吸引读者会选择一些热门题材,并根据读者的反馈调整写作思路,甚至被读者牵着鼻子走;另一方面“催更”是读者常用的手段,与之对应的是作者“加更”的行为,在读者的催更中作者化身码字机器不断提高更新频率,从日更一次、两次到日更三次、甚至四次,工作时间被迫延长,还有一些作者为了积累粉丝,积极与读者交流互动,通过回复评论、发送红包的方式讨好读者,逐渐与自身创造的劳动产品相异化。

在计件薪资机制下:①日万起步上不封顶。既然暂时成不了金榜大佬,就先成为劳模。9.1/码字13000+、9.2/码字14000+、9.3/码字18000+、9.4/码字12000+……9.30/码字20000+……。(田野记录:20220901)②日万自救。从9月1日收益150+到9月18日收益640+……日万才能增加收益。(田野记录:20220919)③日万才能月万。从日五百到日三千再到日万,坚持一百天,必须单本收益过万。(田野记录:20221026)

在竞争激励机制下:①幻言的作者v后基本都是日六、日九、日万,因为日三根本没有竞争力。(田野记录:20220326)②.幻言非常卷,有作者夹前爆更八万。(田野记录:20220622)③日万在幻言已经不行了,大家开始日一万三四五六七……好怀念以前大家一起日三的时光。(田野记录:20221020)

在评价反馈机制下:①写自己喜欢的,扑了;写读者喜欢看的,收益可观,所以我只能选择写读者爱看的。(田野记录:20220321)②最开始“为爱发电”,但后来越来越焦虑,主动迎合读者口味,但写的过程很痛苦。(田野记录:20220423)③被读者吐槽节奏太快,信心备受打击,写不出更新了。(田野记录:20221124)

3. 劳动者主体性被不断消解

平台通过宣扬少数网络作家的“成神之路”实现了对梦想的制造,通过制定各种规则与制度实现了对公平感知的制造,通过把劳动过程组织为游戏实现了对热心玩家的制造,劳动者在这三种意识形态的宰制之下积极投身平台劳动,参与到对自身的剥削中。具体来看,兴趣使劳动者完成了从读者到作者身份的转变,梦想让他们将自我价值的实现寄托在网络文学创作中,然而,现实中赚钱是大部分签约作者坚持写作的主要原因。公平感知使劳动者将平台标准内化为自觉行动,但一些硬性规定如作者必须在作品发布之初确定好体裁、原创性、性向、风格等将劳动者的文学创作限制在固定的内容模式之下,个性化写作逐渐屈从于单一的评价标准,原本吸引人的文学创作活动成为异己的存在,写作带给劳动者愉悦、轻松和自由的情感体验越来越弱,劳动者梦寐以求的创作天堂实际上是“梦工厂”,网络作家群体本质上是网络文学平台上的数字劳工。

兴趣与梦想:①写了四五本冷题材,最高收入五千,最低收入两千,但我并不在乎收益,因为创作对我而言仅是一种爱好。(田野记录:20220910)②开始是为兴趣写作,但在写的过程中逐渐迷失自我,会因为读者的评论改剧情,慢慢地写作的目的变成了赚钱、出名和卖版权。(田野记录:20220621)

公平感知:①A平台是所有网文平台里最公平的,没有好榜单是我写的差。(田野记录:20220607)②幻言虽然卷但排榜十分公平,只看收藏和收益涨幅,不扶贫。(田野记录:20220406)

游戏化:升星成为很多作者的渴望。①本人签约三年左右,理工科研究生在读,累计写作三百万,完结六本小说,但还是空星,所以十分想升星。(田野记录:20220911)②一直是一星,同期数据比我差的都

已经出版了,我这辈子还有升星的一天吗?(田野记录:20220910)③比空星升一星还困难的事是三星升四星或五星。(田野记录:20220713)

去玩乐化:①会对自己写的东西产生强烈的厌恶感,最严重的时候会呕吐,整个人处于极端的状态,根本写不下去。(田野记录:20220701)②为什么越来越厌恶写作过程?明明写完一章很有成就感、很开心,但每次写之前就是不想开始。(田野记录:20220217)③我觉得码字严重影响到了我的生活质量,我把它当作爱好,但它并没有让我产生愉悦感和幸福感。(田野记录:20220727)

当然,劳动者并非任由平台资本控制的“原子化劳工”,他们适时采取抵抗策略维护自身的主体性,只不过他们争取到的自主是有限的。在作品分类方面,一些作者通过选择热门题材、添加热门标签来增加曝光度,结果是作品呈现同质化的倾向。在作品审核方面,一些作者通过自测敏感词来快速和顺利地通过平台审核,还有一些作者通过在文章中打“擦边球”来吸引读者订阅,但这一行为容易被举报。在作品字数方面,很多作者采用“灌水”的方式增加文字量,如描写日常生活、大段对话等,但这种做法容易引起读者的不满。在作品排榜方面,一些作者利用榜单制度的漏洞用读者号给自己投票,这一做法容易引起其他作者和一些读者的反感。在作品评价方面,一些作者为了防止某些读者干预自己写作直接在文案中标明不接受任何写作指导,还有一些作者为了避免与读者发生冲突直接删除有争议的评论甚至关闭评论区。

榜单机制抵抗:强烈建议别再管人家自己掏钱投霸王票的了。人家花自己的钱错在哪里了?自负盈亏的事情,为什么非要狙这个榜呢?①赞成,就是眼红呗,嫉妒人家砸霸王的流量,自己又不舍得花钱去砸,要么怕回不了本,要么怕砸了被读者嘲。②本人不砸霸王,但对这种行为不讨厌,因为内卷是趋势,今天没了这个榜,明天还有新手段。(田野记录:20220315)

四、结论与建议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210}数字技术变革了劳动过程的各个要素,其中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使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表现出控制范围扩大、控制程度加深、控制主体增加、控制形式柔化的新特征,而且呈现出控制更加强势、更加隐蔽、更加深刻与更加高明的新趋势。从技术控制机制来看,平台借助算法技术吸纳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并监视平台上雇工、零工与产消者的劳动过程,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升级;从组织控制机制来看,平台通过给予劳动者工作自主性来最大限度地侵占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以及避开劳动关系带来的法律责任与义务,加深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从制造同意机制来看,平台通过对梦想、公平感知和劳动过程游戏化的制造生产了劳动者自发的同意,进一步消解了劳动者的抵抗意愿。劳动者最终围困于算法技术制造的数字囚室,深陷于平台宣传的自由陷阱,主体性被不断消解。

尽管平台经济发展带来众多新的问题和困境,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数字化条件下平台经济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避免和无法回避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要的是如何正确处理劳资关系、破解这些劳动困境,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平台经济健康运行,对此本文提出四点对策建议。

一是超越资本逻辑,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平台经济。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平台以追求更多剩余价值为目的,致力于通过技术控制机制和组织控制机制对劳动过程实施隐蔽的强控制与精密的软控制,这既不利于平台经济健康运行也阻碍了平台劳动者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必须对资本逻辑进行引导,发挥其正面、积极的作用,使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中服务于平台经济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使平台从资本逻辑转向人的逻辑,促进劳动者展现自我个性与实现自

我价值 最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平台经济发展道路。

二是探索劳动关系新内涵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平台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和劳动者的工作性质 传统劳动法框架不再适用于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 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日益突出。因此 有必要调整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厘清平台企业与平台劳动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探索劳动关系新内涵 确立平台经济下的新型劳动关系 并进行配套的劳动法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改革 建立起适应数字技术进步带来的用工模式变化和劳资关系变化的劳动者权益保护网 为劳动者投身平台工作保驾护航 最终实现劳资双赢。

三是强化平台责任 践行共建共享理念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平台企业在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 理应承担起相应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 并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 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导向 而不应以单一经济效益为目标; 以提高劳动者劳动技能和人力资本为导向 而不应以“流量”和数据为指标; 以满足人民美好精神生活需要为导向 而不应以资本操控为目的。必须让人民群众参与平台经济共建和共享平台经济发展有益成果 增强平台劳动者归属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使平台经济成为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坚力量。

四是放大平台经济积极作用 促进劳动者解放 激发劳动者追求自我实现与发展。平台经济为劳动者自主决定劳动时间、劳动地点、劳动内容和劳动量创造了客观条件 为劳动者施展兴趣与追求梦想提供了机会与舞台 为劳动解放和劳动者主体性复归注入了强大动能。因此 必须放大平台经济尊重劳动者、服务劳动者、培养劳动者和发展劳动者这一巨大优势 发挥平台经济激发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主体性的积极作用 使平台劳动真正成为吸引人的劳动 成为个人自我实现的劳动 成为生活第一需要的劳动 使劳动者在数字劳动中实现自我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M].方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 [3]王璐,李晨阳.平台经济生产过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成都:经济学家,2021(6):53-61.
- [4]邹开亮,陈梦如.算法控制下“网约工”权益保护的困境与出路[J].北京:价格理论与实践,2021(06):44-48+93.
- [5]杨善奇,刘岩.智能算法控制下的劳动过程研究[J].成都:经济学家,2021(12):31-40.
- [6]王蔚.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及其情绪剥削[J].成都:经济学家,2021(2):15-22.
- [7]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M].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M].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刘海春.休闲与自由——马克思自由伦理观的当代阐释[J].上海: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1):140-147.
- [13]袁继红,丘仙灵.玩劳动:数字时代劳动与休闲的耦合逻辑[J].北京:哲学分析,2022(2):3-14+196.
- [14]赵秀丽.劳动过程变迁视角下劳资关系的演变与最新发展[J].长春:当代经济研究,2022(5):79-88.
- [15]张铮,吴福仲.数字文化生产者的劳动境遇考察——以网络文学签约写手为例[J].上海: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35-44.

责任编辑:张旭